

歷史中的思想解放運動 和歷史敘述中的「思想解放」運動⁺

賀照田^{*}



這次應邀到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進行學術訪學，我想研究的題目是〈歷史中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歷史敘述中的「思想解放」運動〉。

選擇這個頗為當代的研究題目，首先，當然是想為兩岸更加深入的相互瞭解，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一點力；其次，是因為近年來我在對中國大陸文革結束後精神倫理狀況及其此精神倫理狀況與當時思想政治關係的研究中發現：一方面文革後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中國大陸當代的歷史敘述、歷史理解中被賦予極高的地位，新時期的開始即被敘述為思想解放運動的結果；但與此相對的另一面，則是在這些歷史敘述、歷史理解中，被認為導致了中國大陸新時期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實際上被直接

聚焦敘述為圍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發生的論爭。

無疑，文革後的思想解放運動在當代中國大陸的歷史上非常重要，在相當的意義上，確實可說沒有思想解放運動就沒有中國大陸的「新時期」。但問題在於不能將此開啓了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僅僅或過度敘述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爭。這樣說，是因為把思想解放運動僅僅或過度敘述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爭，在歷史敘述上對應的，便是過分誇大「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對此前歷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是1978年5月發表的）的決定性影響。而這樣會

⁺ 本文係2013年7月15日本院訪問學者學術交流會所發表之論文摘要。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大大誤導我們對實際歷史發生展開過程的掌握。

舉其大者，文革後中國大陸的全國性思潮首推當時國家主導下的「四人幫」批判運動，這一批判運動中的絕大部分雖然沒有挑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正統文革理論，實際上卻以擺脫和毛澤東文革後期思考緊密相關的文革後期激進思潮為目標，而力圖把全國全黨的思想、工作重心轉移到華國鋒等宣導的「抓綱治國」方略上。正是在這一意義上，1977年上半年的四人幫批判，當時便被稱為「思想解放」。也正是以這一1977年上半年便發生的「思想解放」為背景，華國鋒主導的當時中央，得以於1977年8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順利結束毛澤東若活著絕對不會終結的文革，同時把「抓綱治國」正式確定為接下來統一全黨全國思想、指導具體治國實踐的方針大計。只是這作為文革結束後第一輪思想解放政治結果的「抓綱治國」，在它所致力推動的高速度現代化建設方面，很快就碰到了不少問題，使當時無論在黨還是在國家方面都處於主導位置的華國鋒等，覺得在如何治國方面要再度進行廣泛探索。1978年2月華國鋒在全國五屆人大上所作的〈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鬥〉的政府工作報告結尾，便核心傳達著當時中央國家的這種鼓勵探索的意識。

顯然，這時華國鋒所主導的中央已經看到了——他們所致力現代化建設事業對他們已有的治國方略形成的種種新要求新挑戰，這種認識使他們覺得要在原有的「抓綱治國」基礎上，呼籲新一輪的「解放思想」。正是以這次的「解放思想」為契機，在科技問題、管理問題、經濟體制問題等方面都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觀念轉換。也正是在中央和國家推動的這一廣泛的思想解放熱潮中，我們才能理解華國鋒1978年「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

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等當時影響很大的這類言論所指為何。

在這一意義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只是以1978年前的「思想解放」為前提的1978年思想解放熱潮的一個部分。這一部分當然有其特別的一面，就是它區別於其他思想解放努力的特殊性在於，它挑戰的是文革後思想解放運動中一直沒有被正面挑戰的「兩個凡是」。但如此，並不意味著其他未正面挑戰「兩個凡是」的思想努力就受兩個「凡是」束縛。因為如果其他思想努力真受兩個「凡是」束縛，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及多方面觀念的急劇調整就不會發生。而這些思想努力中的大多在實際很少受兩個「凡是」影響的情況下卻不挑戰「兩個凡是」，是因為挑戰「兩個凡是」一定涉及到——在當時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複雜的如何妥善安排毛的遺產而又不引發破壞性結果的問題，因此這些觀念變化、思想努力涉及的主要是具體領域，而非正面挑戰毛的權威。

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殊性，在於它為正面討論具有多方面歷史效應的毛的遺產問題打開了一個缺口，在於由此導致的人事上和相關觀念感覺上的變化。從這點來說，它的貢獻很大。但問題是，不能因此就否認，許多實際更有關中國未來面貌、走向的重要變化，主要是通過思想解放運動中的其他努力實現的，而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以能在當時的歷史中發揮重要作用，實和它能從整個思想解放運動所引發的諸種觀念變化及其與此相應的人事變化等中借力有關。也就是，假如我們對比毛澤東逝世時和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時的有關狀況，我們會發現，在一年半多一點的時間裡，無論是占歷史優勢位置的理論，還是怎樣的實踐被界定成有檢驗理論資格的實踐，和誰有資格參與裁定實踐對理

論的檢驗等等方面，都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而在把思想解放運動僅僅或過度敘述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爭的歷史理解、歷史敘述中，歷史—觀念意涵豐富的思想解放運動卻有太多在歷史實在過程中有重要位置的部分被隱去，並誤導歷史認識把這一複雜的歷史過程過分看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兩個凡是」勝利所造成的認識論翻轉——所引發的效應，也就是，歷史—觀念意涵豐富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歷史認識中實際被先入為主地界定為對真理的真誠追求與面目可憎的教條主義的對立。這樣，不僅時間跨度更長、內容更為豐富、對歷史很多方面變化有著實際重要性的眾多思想努力被此種歷史敘述、歷史理解略去，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得以在當時發揮重要作用的——這討論背後的豐富歷史—思想—政治過程也不可能被去真正審視和打量。

正是有感於與思想解放運動有關的這一歷史敘述、歷史理解現狀，我設計了《歷史中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歷史敘述中的「思想解放」運動》研究計畫，試圖通過認真描述實際上時間跨度更長、內容更為豐富的整個思想解放運動的歷史過程，及其內部多種思想努力所包蘊的多方面的歷史—觀念意涵，一方面意圖使在現在的歷史敘述歷史理解中被隱去、但對歷史實際展開卻有著重要影響的眾多思想努力浮出海面，使它們有效進入我們的歷史敘述、歷史理解視野；另一方面也意圖通過努力重現此實際時間跨度更長、內容更為豐富的思想解放運動的歷史實貌，使此前被過分關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的實際歷史位置、實際歷史意涵能被更準確地認識和理解，從而為我們更切實、深入地理解中國大陸「新時期」的興起，提供更準確的歷史—觀念理解背景。

